
建国初期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风习变迁的影响*

——以九江为例

汪红梅¹

(九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系统中心江西九江 332005)

摘要：建国初期的新中国步入了计划经济时代，全国各地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九江的商品经济发展也迎来了一个新的跨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新社会的风习在移风易俗下也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貌，风习的变迁固然是在政治变革下发生的，但经济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反之风习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发生着作用，它们在相互影响中变化发展着。

关键词：建国初期；商品经济；社会风习

中图分类号：I 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 4580(2017)04 — 0083 — (07)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迈上了新台阶。饱受战争创伤的全国人民迅速投入到新社会的恢复和建设中，随着新社会所带来的新发展、新气象，人们的思想、行为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新的风习在那些轰轰烈烈的建设和运动中迅速形成和蔓延。九江作为长江中下游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城，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洗礼，也以崭新的面貌在历史的洪流中奋勇向前。

一、九江商品经济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三年恢复时期、三年改造时期及三年大跃进时期，在六十年代初期经过一定程度的调整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找出问题所在，并由于“左”倾错误最终导致了十年“文革”的到来。虽然“文革”前的十多年掀起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运动，但从1952年开始的五年国民生产计划也是在按部就班地贯彻执行。经济发展夹杂在政治运动中，必然会深受影响，但与旧社会相比，商品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九江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天地。

(一) 九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1. 在生产领域，初步建立了工业基础

¹ * **基金项目：**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课题“近代以来九江商品经济发展与社会风习变迁研究”(编号SHXTX1513)系列文章之一；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编号SHXTX1610)阶段性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7 — 07 — 02

作者简介：汪红梅(1977 —)，女，九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解放前，九江的国民经济基础相当薄弱，人民政府接管的工业只有三十多家，从事纺织、发电、火柴、面粉、制米、陶瓷、染丝、榨油、轧花、酿酒、竹木加工的小工厂、小作坊和家族手工业，连拥有机器生产的兴中纱厂，也因战乱破坏，处于破产困境。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九江都实现了许多突破。在“一五”计划期间，九江市新建了电力、纺织、机械、造船、建材、食品等一批企业，至1957年，全市工业企业数已达812个，其间工业企业户数净增673户，增加4.8倍，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40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749个，公私合营工业企业23个。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06亿元，增长1.5倍，年平均递增20.2%。^[1]“二五”期间，九江市先后创办了长江化工厂、九江畜产制革厂、九江船厂、九江电信器材厂、九江仪表厂、九江火力发电厂、云山煤矿机械厂、恒丰机器厂、九江第三棉纺织印染厂、九江针织服装厂、九江油脂化学厂、九江化工厂、九江磷肥厂、九江动力机厂、九江微型电机厂、庐山水泥厂、九江玻璃纤维厂、九江食品厂、九江肉类联合加工厂等一大批轻纺、化工、冶金、机械、陶瓷、电力、塑料、皮革、仪表、造船等工业企业。1962年底，全市工业企业数为794户，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181户，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611户，公私合营工业企业2户，实现工业总产值1.15亿元。1961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1963—1965年三年调整时间取得了明显成效。九江市人民政府在中央、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统一部署下，着手调整工业发展速度，放慢工业发展步伐，对生产方向不够明确、产品质次价高的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并大量精简职工，对新建基础工业企业进行扩建和改造。经过调整，九江市工业生产逐步回升，到1965年底，全市工业企业数为534户，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153户，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381户，全市工业总产值1.74亿元，较1962年增长40.9%。^[2]通过新中国初期大规模的发展建设，九江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基础。

2. 市场及消费：计划供应，限量消费

九江历来是长江中下游商品集散地，清代以后，市场经历多次兴衰起伏，曾经历清咸丰、民国初期、抗战胜利三次兴盛。解放后经过三大改造，商品流通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交易按计划购销。经过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随后一系列合并、过渡，再调整，基本形成国营商业为领导，供销社、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为助手的商品零售模式。建立了商业的专门经营机构，如最早建立的国营九江贸易公司及随后增设的百货纺织品、五交化、副食品、石油、煤炭、商业储运、蔬菜、饮食、工业品等专营公司。

以九江港为例，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九江商业消费城市的特点，也改变了九江港以粮食、农副产品及日用百货为主的传统货源结构，促使港口煤炭、矿建材料、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钢铁、机械、木材等工业用原（燃）材料货种急剧增长，港口开始显示出向工业港发展的趋势。以九江港务局为例，过去一向占吞吐量 $\frac{2}{3}$ 的包子货（包子货通常指袋装盐、粮、棉及日用百货和水泥等）1959年不到 $\frac{1}{10}$ ；相反，过去只占港口吞吐量 $\frac{1}{3}$ 的煤炭、矿石、型砂在1959年中却增长到 $\frac{2}{3}$ 以上。^[3]

在消费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生产力落后，货源不充足，商品匮乏，当时的一些消费品实行定量供应。50年代初的九江，各地糖、酒、糕点、罐头、奶粉上市品种少，销量小，国营商业经营的货源大都由省、专计划分配到县、市城乡。酒类从1952年6月起实行专卖，食糖从1956年起，开始实行对城乡居民定量供应。60年代前期，糕点实行凭证定量供应。1961—1965年间，一般酒都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全国名酒和省产名酒高价零杯销售，每次每人至多只卖1市两。^[4]在定量供应方面，1954年各地开始实行棉布定量供应，1964—1965年，除棉布、豆腐继续凭票定量供应和煤球凭证不限量供应外，1958年后实行定量供应的猪肉、卷烟、鲜鱼等商品敞开供应。如1961年，各地居民只发给3～8月定量布票，每人1.8市尺。1962年每人全年2.6市尺。猪肉从1960年7月1日起，九江市又恢复定量，每居民每月2.5市两，直到1963年。1963年，食糖货源紧张，九江市居民改为每人每月1.5市两。^[5]

3. 工人及职工工资福利收入情况

在解放后的近二十年，因为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在收入分配上也是统一制定分配标准。在1949年5月至1952年工资改革前，当时有两种分配方式，一种是供给制，一种是薪金制，供给制主要是对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实行生活必需品分配制度；而

薪金制是以货币为主要形式支付报酬，主要是针对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及国家机关新吸收的家庭负担较大的工作人员。1956 年国务院进行第二次工资制度改革，九江地区参加工资制度改革的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总职工为 30174 人，改革前人均月平均收入为 33.52 元，改革后人均月平均工资为 41.3 元。^[6]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的地位得到提高，除了工资收入外，还享有各种福利，如办职工食堂，维修职工宿舍，新建托儿所，增加医疗设备等。九江港史记载：为了改善装卸工风餐露宿的状况，分别于 1954 年和 1956 年兴建了两幢工人休息室。为改善九江港职工的住房条件，解放后初期分别兴建了一批职工住房，在九江市内形成了三个较集中的住宅区，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7]其它单位仅 1956 年九江兴中纱厂、电厂、海员（港务局）、商业等六个单位工会，投资 44 万元（公积金和福利费），建砖木结构房屋 1150 平方米，有 400 户工人住进新居，租金每户只一二元。^[8]建国前，个别企业有简单的福利设施，如久兴纱厂有一个医务所（医生一名），一个哺乳室和可供少数人就餐的食堂。建国后，在政府的推动下，各单位迅速兴办起一批福利设施。1952 年，市区各厂矿有诊疗所 3 所，医师 3 人，护士 32 人；企业特约医院 20 个，保健员 35 个；浴室 13 个，其中女浴室 2 个；理发室 9 个，子弟学校 1 所，托儿所 2 所。1953 年，九江各企业的职业福利工作随着生产的提高，逐步增加和改善，如纱厂、火柴厂还建起了职业食堂、维修职工宿舍、新办托儿所、增加医疗设备等，并建立了管理制度。1954 年，市区企业已建成职业宿舍 228 间，住宿 748 人（1955 年 1711 人），职工食堂 6 个，就餐 509 人（1955 年 3224 人），职工医院 5 所，就医 5449 人，1955 年建家属宿舍 471 间，住宿 2505 人。60 年代以后，各企业逐步建立了“小社会”，职工宿舍、家属宿舍、食堂、医院、幼儿园、托儿所、哺乳室和子弟学校基本满足了职工需要。^[9]

（二）特点

1. 工业发展讲究全而小，效益不高

在“文革”前，经过将近三个五年国民生产计划，九江建立了涵盖重工业、轻工业的各领域的企业。在那个交通不发达，商品流通不便利的条件下，这些企业有利于解决当地的各种需求，达到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但同时因为企业的性质及市场等条件的限制，这些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效益不高，没有竞争意识和淘汰机制，而且这些企业没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很多都是属于重复建设。

2. 工业发展受政治运动的影响

如在“全民大办钢铁”“全面大跃进”等错误思想影响下，小钢铁厂遍地开花，钢铁工业异军突起，生产建设畸形发展，造成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给经济带来很大的危害。全市工商企业登记数最多的 1958 年小钢铁厂达到 1527 户，1958 年全区参加大炼钢铁会战劳动力超过 30 万人，建造了高炉 1400 余座。^[10]

3. 所有制形式单一

经过“三大改造”后，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以在九江的所有生产单位基本上上都是公有制经济，如 1956 年对私营商业改造后，除个体商业占经营总额的 0.4% 以外，其它的都是国有或集体的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虽然有利于集中资源和力量来办事，但缺陷是企业生产积极性不高，效益低下。

4. 带有鲜明的平均主义特色

在计划经济年代，分配和消费都是计划好的，工资收入、住房分配、生活用品的购买等都是按文件、按规章制度、按计划来实施的。在物资特别匮乏的年代，这种方式有助于保证人民生存的基本条件，缓和矛盾。但另一方面，平均主义也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抑制了人们的消费需求。

二、社会风习的变迁

新中国的建立扫除了旧社会长期附加在人民身上的各种压迫，既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思想文化上的，而在思想文化上的改造就具体表现在社会风习的建设上，提倡积极向上、良善的社会风习，摒弃残余的封建落后、愚昧不良的社会风习。

（一）社会风习变迁的表现

1. 爱国主义、建设新中国成为当时最大的口号和风向标，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是行动方向

新中国建立后，九江市民精神振奋，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到新社会的各项建设中，无论是在工业、农业还是在城市建设等方面，人们都表现出高涨的建设热情，以及巨大的能量和创造力。工业方面的建设成就前文已经罗列，在城市建设方面如：为了适应城市建设和新工业区建设的需要，加快十里铺新工业区的建设速度，组成一个完整的干道系统，中共九江市委决定组织五万劳动大军，苦战七昼夜，扩建环湖和跃进大道。^[11]以及全区各地组织大规模向荒山秃岭进军，改造自然面貌的群众性绿化运动。^[12]像这样通过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的建设活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比比皆是，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建设新中国的社会潮流。

在爱国主义方面，保家卫国，捍卫新生政权，同各种国内外反动力量作斗争在九江市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 1951 年的“五一”，为声援抗美援朝，全区机关干部、工人、学生、市民以及工商界、医务界、宗教界等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参加“五一”大游行群众的共计 933476 人，占成年人总数的 53.9%。而且九江市民踊跃参军，积极拥军，如九江地区青年自愿报名参军人数达到 14 余万人。^[13]在土改及“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广大九江市民积极参加，扫除不良分子和行为。如剿匪反霸，斗争恶霸地主，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使得人民认识到过去骑在人民头上做威作福的反动势力被清除，恶霸遮天、地痞横行、残害百姓的乌烟瘴气被一扫而空，各界安居乐业，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其它的一些活动也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进行，如爱国卫生运动，订立爱国公约，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等，通过这样的一些宣传和教育，极大提高市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形成一种爱国主义的良好风习和积极参与到各项爱国活动中。

2. 由重商转向重编制内、体制内

九江历来商业氛围相对而言较为浓厚些，从商人数也较多，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大改造，消除了大量存在的私有制，于是有单位成为人人向往和追求的目标。端上“铁饭碗”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人人都以是编制内、体制内的人而自豪。建国初期，人民政府对职工是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由国家“统包统配”，成为用人单位的固定职工，不得随便辞退。到 1957 年，九江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正式形成，企业实行了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1949 年，工业企业职工人数为 0.19 万人，1952 年为 0.5 万人，1957 年为 0.87 万人，1962 年为 1.28 万人，1965 年为 1.32 万人。^[14]因为在收入福利方面是计划分配，贫富无明显差距，又由于工人队伍的迅速壮大，工人的地位显著提高，成为工人老大哥。人人都以能有工作有单位为荣，如九江居民区西园在解放后，柳氏宗祠成为了这一带居民活动中心了，每逢周一、三、五居民小组就集中在这里学习、读报、讲时事、教唱歌曲，这里还办“扫盲识字班”，识字上千者还颁发“扫盲证”，先进人物还到市文化宫开会。一到该唱歌的晚上，妇女儿童都聚集到这里由“九师”派的学生在这里教唱，非常热闹。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开始大量需要劳动力，为了尽快把妇女从锅灶台边解放出来，于是加紧识字班管理，一批又一批妇女通过扫盲走进了工厂、商店、菜市场、饮食服务行业。一些当年从“柳氏宗祠”扫盲后参加社会活动的妇女们都已 70 左右高龄，每每谈到当时在祠堂内扫盲、唱歌都能勾起老人们美好的回忆。^[15]

3. 提倡良好风习，如勤俭节约、以劳动为光荣，积极上进的风习等，大力宣传一批优秀劳模，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全社会大力提倡勤俭节约、劳动光荣的风气，在九江通过宣传、教育、

组织活动也很快形成了这些良好的风习。在工人中九江市工会通过组织工人举行劳动竞赛，变役使性劳动为主动性劳动，并按照不同的形式提出不同的内容，比如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帝国主义为内容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以恢复经济为内容的增产节约劳动竞赛，以改革创新为内容的技术革新劳动竞赛。^[16]通过这些形式的竞赛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提倡以劳动为光荣、以节约为美德的风习。1952 年仅九江市，就有 32 个单位 5662 人参加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特别是兴中纱厂、邮电局、港务局、石油公司、火柴厂等单位，涌现一批先进事迹和模范人物，如创造瞿兰香落纱互助清洁法和细纱接头法，石桂英摇纱法，吴金桃小组经验；海员殷长林首创航行一列式拖带法，周自本开创木排直航上海的先例等。^[17]各级工会还开办了职工政治夜校、职工文化补习班，工人文化宫、职工俱乐部和职工图书馆等设施的建设，这些都有利于丰富工人的生活，同时提倡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习。1951 年 2 月 19 日《九江日报》上刊载《往年赌博、打牌过春节，今年玩花灯、扭秧歌》，1961 年 1 月 3 日《节日生活丰富多彩，文坛艺苑万紫千红——九江市人民欢欢喜喜过春节》等文章，都反映了新中国初期九江市倡导和逐步形成的良好风习。在勤俭节约风习上，也是不遗余力地大力宣传和提倡，1952 年 12 月 4 日和 7 日的《新农村报》刊文《学习工人老大哥，努力增产节约》、《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以及 1961 年 1 月 10 日《九江日报》刊文：《勤俭老人汪翠枝》、《书记的传家宝——访克勤克俭的党总支书陈开侗》《克勤克俭话书记》等。通过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勤俭为美德的风气，如许多搬运工人自备节约袋，将散落在地上的物品捡起来，交给物主；1954 年，仅火柴厂通过竞赛就节约 1.38 亿元（旧币，后同），兴中纱厂 1955 年仅 7 月一个月就节省 1.46 亿元，降低成本 8.5%。^[18]

4. 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风习的转变

九江自近代开埠通商以来，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受西化影响相对比内陆其它城市要大些，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的进行，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的风习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衣着打扮是社会综合信息的载体，反映了一定时代、一个地方的特色和人们的审美观。建国初，九江城镇中老年普遍穿干部服、中山装，青少年多穿列宁服、学生装。50 年代中至 60 年代初，知识界男青年爱着青年装、便装棉袄、短大衣，女青年爱穿短衬衫、三角裙。50 年代鞋袜上，流行浅帮胶底鞋、马口套鞋和浅深统球鞋，中青年干部爱穿浅、深统皮鞋和皮凉鞋。60～70 年代，解放鞋、塑料凉鞋、浅统皮鞋和深统套靴普及城乡。60 年代后，长筒袜被淘汰，短筒棉纱袜、丝光袜、尼龙袜、锦纶袜相继进入千家万户。建国后，青少年男子爱剪游泳头，女子结双辫，中年妇女多夹燕尾式或发髻式。建国后，男子常戴青蓝色解放帽，夏戴麦草帽、太阳帽、运动帽，冬戴毛呢干部帽、防风帽；女子兴扎花头巾，有时折成三角形作围巾；儿童多戴小绒球帽。^[19]这一时期穿着打扮上的风习主要体现为简朴实用的特点。

解放后，九江的城市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形成了三个集中的居住区，甘棠湖、闸口以北，龙开河以东为中区，居住密度高达 282 人/公顷，以一、二层木结构房为主；龙开河以西及闸口以南为西区，以棚户为主，居住密度 101 人/公顷；南门外以北，老鹳塘以西为东区，以一、二层木结构房屋为主，居住密度 114 人/公顷。^[20]房屋的居住结构及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以老居民区西园为例，1949 年九江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西园的环境进行了治理整顿，1951 年对私房进行验契登记，并发“房地契证”。1958 年对凡出租 80 平米以上的私房，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许多富裕之家、商贾名流的旧宅都划作了公房。几乎所有的“大屋”都变成多户杂居的大杂院，房产由房管所统一管理、分配、维修。那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提倡“先生产，后生活”，对住宅的建设几乎都停止。^[21]

行的风习变化，主要表现在较为新式的现代交通工具愈来愈受到人们欢迎，现代交通工具日益发展，而一些传统的交通工具如轿子、人力车被逐渐淘汰。公共汽车迅速发展。自行车作为重要的代步工具，也在不断增多。这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份现代气息。据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在那个年代，早上上班时间，一群群统一穿着工作服的九江国棉厂的工人骑着自行车行驶在路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形成了。

在生活其它方面还提倡了一些良好风习，如提倡讲究卫生，九江市区解放前的环境卫生状况不佳，民国 24 年（1935 年），九江市政府委员会所编《九江市政》称：“人民对卫生素质不甚讲求，种种污秽拉杂之现象随处可见。”解放后，城市环境卫生

工作步入正规，健全管理机构、培训队伍、坚持卫生制度，面貌大为改观。1953 年 3 月 4 日，九江市评为全省甲等一级卫生城市，九江专区专员龙标桂评为全省甲等爱国卫生模范。1956 年，九江市获爱国卫生运动先进市称号，1958 年，九江市评为全国卫生城市。^[22]

5. 革除旧弊，提倡新兴的风习

革除旧弊，主要有禁赌禁娼禁毒工作的开展，吸毒、赌博、嫖娼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公害，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九江全境解放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遵照上级指示，在领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的同时，进行社会改革，把整顿社会风尚，建立革命的社会新秩序，作为社会民主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发动人民群众开展禁毒、禁赌、禁娼斗争，查禁贩毒吸毒和聚众赌博，取缔卖淫嫖娼，维护社会治安，净化社会风气。新中国成立后，九江市禁烟禁毒工作成效显著，查获毒品案件 39 件，逮捕贩运销售主犯、惯犯 30 余人；缴获鸦片毒品 200 余两；没收毒具 400 余件，将毒品、毒具予以烧毁；对毒犯给予法律制裁，结束了烟毒对九江人民的危害。^[23]通过开展禁赌斗争，查处了一批聚众赌博的赌头、赌棍，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好赌分子，使赌博这一社会公害降到最低程度，基本上杜绝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赌博恶习。对于嫖娼，通过采取逮捕收容、教育改造、安置就业等措施，一个以贩卖人口、摧残妇女、勒索钱财、藏匿盗匪、散播病毒、污染社会的卖淫行帮基本得到杜绝，稳定了社会秩序，净化了社会风尚。另外在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宗族观念上，也组织了大量宣传和组织活动。

在革除旧弊的过程中，同时破旧立新，树立新风。九江解放后，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提高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1949 年 11 月，成立由七人组成的九江专区妇女工作委员会。通过积极培养基层妇女干部，宣传女劳模和先进人物，鼓励妇女走出家门从事生产劳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运动中，鼓励妇女积极参与，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通过宣传贯彻《婚姻法》，达到废除婚姻家庭问题上的旧礼教、旧习俗，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从而提高妇女的思想觉悟。

6. 不良风习仍存在，突出体现在政治运动时期的风习

如大跃进时期的急躁冒进，如反右时期的扩大化，据 1958 年 9 月统计，九江专区共有 1094 人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极右 84 人。^[24]整风和反右斗争有一定的必要性和意义，但反右的扩大化，使得一些活跃的、富有建设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受到压制，求真务实的作风受到打击，导致了随后一些不良风习的发展蔓延，如虚夸风，盲目冒进的作风等。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形成了一个献铁、寻铁、为钢而战的热潮。8 月 31 日，庐山全山收集废钢铁二万多斤，云中垦殖场一个 4 岁小孩一上午也拣了四斤铁。九江市发动各户居民、机关单位干部献废旧钢铁，为大炼钢铁出力。据统计，9 月 22 日全市参加献铁人数 31400 人，献铁 2336 吨。9 月 25 日九江市 400 多劳力和 30 多名干部组织远征，开赴德安傅山挖煤炼焦。根据 9 月 25 日的统计，九江专区十八万钢铁大军狠攻燃料关，完成燃料七万吨，让已建 2100 多个土高炉，炉炉吃饱不断“粮”。^[25]这种在后人看来是极端可笑和错误的运动在当时却掀起了全民的热潮。

（二）社会风习变迁的特点

1. 以政治挂帅，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改变风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充分发挥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热情，充分发挥党的影响和威望，运用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和群众运动来铲除旧风习，倡导新风习。如 1960 年 1 月 9 日的《九江日报》就有一个大标题《除害灭病讲卫生，干干净净迎春节》、《九江市开展清洁卫生大扫除》。如在声援抗美援朝运动中，通过发动群众亲身参与各种活动（大型时事报告会、纪念性集会、大游行示威、各界代表会议、订立爱国公约等），使群众思想发生显著变化，极大提升九江群众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热情。如在认购公债的动员上，1950 年 1 月份的报纸连续刊文发动。这种方式使得风习改变的速度特别快，效果比较明显突出。但运动的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2. 以表彰、大力宣传的方式来树立风习的榜样

运用先进人物的榜样示范作用来影响改变风习是最鲜明有效的途径，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人争先进，人人学模范的时代潮流影响下。九江市也是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对先进人物进行表彰、宣传来倡导良好的风习。如1960年1月15号的《九江日报》就用诗歌、记述等方式讴歌了跃进中的各岗位的劳模，开辟了一个专题《总路线的旗手，大跃进的标兵》，连载了一批典型的劳模。通过对这些劳模虽平凡，却有着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等精神的宣传来影响社会风习。再如当时提倡勤俭节约的风习，也是通过报纸宣传、表彰等方式把相关人物作为榜样来影响社会风习。

3. 新、旧风习杂糅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在移风易俗上，国家、社会、团体都运用各种方式提倡新风习，但毕竟风习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所以在很多方面，旧风习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尤其在农村地区、文化层次较低的、年龄偏大的群体，如封建迷信思想、男尊女卑的意识、陈规陋俗等仍存在。

4. 良善和不良风习并存

由于风习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政治挂帅和上层影响下，提倡的良善风习会很快产生效果，但如果倡导的风习是不良的，同样也会迅速在全社会传播开来。如从五十年代末开始的冒进、急躁、“左”的思想和行为也会在社会中影响很大。

三、两者的相互关系。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决定了社会风习变迁

影响社会风习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因素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移风易俗也是政治任务之一。但归根到底，经济的因素还是决定性的。

1. 决定了风习变迁的方向

解放后，经过“三大改造”，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与解放前相比，商品经济在性质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带来了社会风习的巨大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完全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变化，如公有制及计划分配的实现带来了风习中的人人平等的观念；大量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使得工人老大哥的地位明显提升；物资的缺乏及按量分配使得社会中大力提倡勤俭节约之风。经济的发展成为了社会风习变迁的决定性因素。

2. 决定了风习变迁的内容

与解放前相比，九江的社会风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重商变为重“铁饭碗”；由崇洋崇奢变为提倡勤俭节约、大方朴素为美；旧社会中的一些丑恶风习，如毒赌嫖等一扫而光，新社会中风清气正。之所以社会风习的内容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商品经济的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判断标准。正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巨大变化，才会有风习的内容变化。

3. 决定了风习变迁的特点

影响风习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方面，不同的因素对风习变迁的影响特点是不同的，如政

治运动对风习变迁的影响是迅速和有效的，但持久性不够，一旦政治运动一过，风习也会随之而动，而商品经济发展的变化对风习的变迁是潜移默化和影响深远的。因为商品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直接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经济的方式就会直接体现在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方式、行为习惯中，这就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风习。而且只要商品经济的方式不发生大的变化，风习就不会发生明显的变迁。

（二）社会风习变迁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变化起一定的反作用。

1. 良好的风习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九江的风习与解放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一些良好的风习，如主人翁的意识表现出来的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勤俭节约、劳动光荣等风习，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有利的促进作用。当时国家处于物资匮乏时期、人力物力财力都非常有限，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就必须有人民的支持，而这些良好的风习就有助于克服困难，凝聚共识，从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2. 不良的风习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五十年代末期，因为领导人的错误认识，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表现在风习上就是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以致于违背了客观规模，这些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破坏作用。比如在大炼钢铁中，用烧炭来炼铁，1958年冬，九江在两个月生产过程中，不断传来“一斧能砍万斤柴”传说，15华里长杨岭原始森林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秃顶，大会战砍伐森林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26]这些风习下的行为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破坏作用。

九江，这座长江中下游的小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洗去了近代开埠通商以来的被侵略的色彩，也冲走了与之相适应的诸多社会风习。九江的经济建设成绩斐然，社会风习也面目一新。在新中国全国一盘棋的形势下，九江与其它一些城市都是整个新社会中的一个缩影，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已然由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时代步入到市场经济时代，社会风习也将随之又有了新的内容和特点。

参考文献：

- [1][2][6][9][10][14] 九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九江市志(第二册) [M].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4. 8.
- [3]《九江港史》编写委员会. 九江港史 [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1. 225.
- [4][5][20] 九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九江市志(第三册) [M].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4. 49.
- [7]《九江港史》编写委员会. 九江港史 [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1. 220.
- [8] 九江市史志办编. 九江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资料汇编 [Z], 九江: 2012. 86.
- [11] 江才. 政治挂帅, 全民动手, 苦干加巧干, 建设新九江——九江市五万大军修筑环湖、跃进大道 [N]. 九江日报, 1960 — 01 — 08(1)
- [12] 九江专区绿化指挥部通讯组. 乘大好跃进形势, 绿化祖国河山——我区绿化运动揭开序幕 [N]. 九江日报. 1960 — 01 — 09(1)

[13][16][17][18][23][24][25][26] 九江市史志办编. 九江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资料汇编 [Z], 九江: 2012. 17.

[15] 政协浔阳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百年西园 [Z]. 九江: 2005. 49.

[19] 九江市文化局编. 九江市风俗志 [Z]. 九江: 2000. 148 — 149.

[21] 政协浔阳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百年西园 [Z]. 九江: 2005. 41.

[22] 九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九江市志(第一册)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472.